

中文版序

陳子善

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研究員

2006年3月，北京商務印書館出版熊式一先生的劇本《王寶川》中英文對照本。四年之後，也即2010年10月，拙編熊式一的散文集《八十回憶》由北京海豚出版社出版。再兩年之後，也即2012年8月，熊式一的長篇小說《天橋》也由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出版中文本（此書原為英文本，後由作者自譯為中文）。竊以為，這是熊式一中文作品傳播史上幾次較為重要的出版，標誌著在作者去國七十多年之後，他的代表性作品終於重歸故土，與廣大讀者見面了。當然，他的中文作品早已在港台印行。

早在二十世紀20年代末，熊式一就在《小說月報》、《新月》等新文學代表性刊物上亮相，1930至1940年代他又因《王寶川》、《天橋》等作品享譽歐美。但1949年以後，他的名字就在中國內地銷聲匿跡達半個多世紀。1988年，年屆古稀的熊式一才有機會回國探親。他1991年病逝於北京，總算了卻了葉落歸根的夙願。然而，翌年《中國現代作家大辭典》（中國現代文學館編，新世界出版社出版）出版，書中已經有了林語堂的條目，卻依然未見熊式一的大名。直到熊式一逝世15年之後，他的主要作品才陸續在內地問世。

我之所以一一列出以上這些時間節點，無非是要說明一個不爭的事實，那就是我們忽視熊式一太久，我們虧待熊式一也太多了。

我曾經在《天橋》大陸版序中寫道：「綜觀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至少三位作家的雙語寫作值得大書特書。一是林語堂（1895–1976），二是蔣彝（1903–1977），三就是本書的作者熊式一（1902–1991）。」時至今日，我們對熊式一的了解又有多少？中國學界對熊式一的研究，不說過去，就是近年來，又有多大進展呢？

對於我個人而言，真要感謝1980年代主編《香港文學》的劉以鬯先生。由於那時我也是《香港文學》的作者，所以，熊式一先生在《香港文學》上發表譯作和連載文學回憶錄，我都注意到了。我終於知道了中國現代文學史上還有一位獨樹一幟的熊式一，從而開啟了我與熊式一的一段文字緣，為他老人家編了《八十回憶》這部小書，為《天橋》內地版寫了一篇序，雖然熊式一本人已不可能看到了。也因此，我才有機會與本書作者鄭達兄取得了聯繫。

2021年9月，我意外地收到鄭達兄從美國發來的微信，始知他剛從波士頓薩福克大學英語系榮休，還得知他所著 *Shih-I Hsiung: A Glorious Showman* 已於2020年底由美國 Fairleigh Dickinson University Press 出版。這真是令人欣喜的空谷足音。已有研究者慧眼識寶，不僅致力於熊式一研究，而且已經寫出了熊式一的英文傳記，多好啊！他選擇熊式一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顯然對熊式一其人其文及其貢獻，有充分的認識。兩年之後的今天，鄭達兄這部熊式一英文傳記的中文增訂本將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推出，無疑更是喜上加喜了。

我一直以為，研究一個作家，建立關於這個作家的文獻保障體系是至關重要的。其中，這個作家的文集乃至全集，這個作家的年譜，這個作家的研究資料匯編等，缺一不可。這個作家的傳記，尤其是學術性的傳記，自然也是題中應有之義，不可或缺。中國現代作家中，魯迅、胡適、周作人、徐志摩、郁達夫、張愛玲……早已都有傳記行世，有的還有許多種。以熊式一在中國現代文學史和現代中外文學和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地位，也應該而且必須有他的傳

記，讓海內外讀者通過傳記走近或走進熊式一，對熊式一產生興趣，進而喜歡熊式一的作品，甚至研究熊式一。這是熊式一研究者義不容辭的職責，而這項富有意義的工作由鄭達兄出色地承擔並完成了。

撰寫熊式一傳的難度是可想而知的。由於熊式一去國很久，更由於他在英國、新加坡、香港和台灣地區等多地謀生的經歷，搜集整理關於他的生活、創作和交往的第一手史料並非易事。再加熊式一「一生扮演了多重角色：學徒、教師、演員、翻譯家、編輯、劇作家、小說家、散文作家、傳記作家、戲劇導演、電影製片人、電台評論兼播音員、藝術收藏家、教授、文學院長、大學校長」等等，在中國現代作家中幾乎不作第二人想。這樣豐富而又複雜的人生，一定給撰寫熊式一傳記帶來少有的困難。但鄭達兄充分利用他長期在海外的有利條件，多年銳意窮搜，不折不撓，還採訪了熊式一的諸多親友，尋獲了英國文化藝術界當年對熊式一的眾多評論，終於史海鉤沉，爬梳剔抉，完成了這部首次披露許多重要史實，內容豐富、文筆生動，同時也頗具創意的熊式一傳，較為圓滿地達到了他所追求的「比較完整、準確地呈現熊式一豐采多姿的人生」的目標（以上兩則引文均引自本書鄭達的〈前言〉）。

更應該指出的是，鄭達兄這部熊式一傳，不但填補了熊式一研究上的一項極為重要的空白，也給我們以發人深省的啟示。中國現代作家中之卓有成就者，大都有到海外留學和遊學的經歷，或歐美，或東瀛，或西東兼而有之，甚至進而在海外定居多年，成為雙語作家，揚名海外文壇的，也大有人在，如英語界的林語堂、蔣彝，法語界的盛成等等，熊式一當仁不讓，也是其中傑出的一位。他們大都走過這麼一個創作歷程：先中文，再西文，最後又回到中文；林語堂是如此，盛成是如此，熊式一也不例外。鄭達兄的熊式一傳就很好地展示了這一過程。中西文化在包括熊式一在內的這些中國作家身上碰撞、交融以至開花結果，而且這些中國作家把中國文化通過他們

的作品成功地傳播海外，這是很值得中西文學和文化交流研究者關注並進行深入研究的。以往的研究一般只注重他們中文寫作的前一段或西文寫作的後一段，往往顧此失彼，也就不能全面和深入地把握這一頗具代表性的國際文化現象。鄭達兄的熊式一傳正好為研究這一國際文化現象提供了一個難得的範本。

因此，我樂意為鄭達兄這本熊式一傳作序，期待熊式一研究和中國雙語作家研究在這部傳記的啟發下進一步展開。

2022年10月9日於上海梅川書舍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具有版權的資料

英文版序

吳芳思 (Frances Wood)

前大英圖書館中文部主任、漢學家

20世紀中國經歷了巨大的蛻變，從滿清皇朝被推翻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從長衫大褂的舊式傳統進入西服革履的摩登時代，從文言文改用白話文。如果要遴選一位能代表這一時期的人物，熊式一無疑是最佳的人選。他出生於世紀之交，浸淫於舊式的傳統文化，但很快便積極投入西風東漸、革故鼎新的20世紀。他身體力行，與1920年代和1930年代許多知識分子一樣，出國去了西方，穿上洋裝，學習研究英國戲劇。他不失時機，創作了蜚聲遐邇的戲劇作品《王寶川》(*Lady Precious Stream*)，一身絲綢長衫、戴著玉手鐲，弘揚中國傳統文化。

熊式一對舞台藝術的精湛研究，可上溯到1920年代後期，他當時在北京，開始翻譯J·M·巴蕾(J. M. Barrie)的劇本。1932年，他去英國，原打算在倫敦大學研究英國戲劇，結果卻將一齣傳統京劇的故事成功改編成英語話劇。

自1934年後的幾年中，《王寶川》在倫敦和紐約上演，轟動一時，其劇作者名聲大振，文學界的名人作家紛紛與他交友往來。我還記得，參觀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故居時，曾經驚喜地發現書桌上展放著熊式一的名片，那戲劇界巨匠與他的友情可見一斑。

與蕭伯納一樣，熊式一注重教育事業，那也是清末民初中國的思想 and 政策上一個主要方面。自1912年始，民國政府便致力於教育的轉型和改進，熊式一孩童時代那種狹隘的死記硬背儒家經典的傳統方法被摒棄，取而代之的是充實豐富的現代課程。1919年的五四運動，普及了白話文的寫作和出版，並加速了這一轉變的進程。熊式一幼年熟讀四書五經，然後隨著中國的變化，在南昌和北平一些新式的學校求學和任教，日後又去新加坡參與創建南洋大學。最後，他在香港創辦清華書院，以紀念他1910年代曾在北平就讀過的著名清華大學。我記得去香港拜訪他時，他身上的長衫和玉手鐲，在希爾頓酒店的大堂內相當惹人注目，後來又去他在界限街¹（他認為這街名寓意深遠）的寓所小坐。那可謂地地道道的文人斗室，四處堆放著書報文稿，幾乎夠到天花板。

熊式一筆耕不輟。晚年改用中文——而不是英文——寫作，不過在經濟收入上不那麼理想。他受到政治形勢的影響，1938年，義無反顧地參與各種形式的援華反日本侵略的活動。1930年代，熊式一遠赴倫敦求學，家眷留在了中國，全家分居中英兩國；1940年代，家人聚合分離，結果分散在美國、英國、中國、香港等地。他的三個孩子，在英國接受教育，牛津大學畢業之後，便回了國；原先留在中國的另外兩個子女，來英國團聚，可惜，全家從未能歡聚一堂、合府團圓過。

1970年代，我在倫敦初次見到熊式一的小兒子熊德達。介紹我們認識的是何伯英，她的父親原來在倫敦的中國大使館工作，1949年之後，滯留英國，住在東芬奇利的林語堂舊居。德達從藝術學院畢業，從事過一陣子電影工作，後來在英國介紹中國烹飪，大獲成功。他的家庭幸福美滿，愛妻塞爾瑪是個畫家，他們有三個孩子。德達的母親蔡岱梅住在附近的瑞士屋，那地區聚居著不少著名的中國流亡者。她小時候家裏有傭人照顧生活起居，1930年代時到了牛津和倫敦，為了招待家中的來客，她學習掌握了廚藝。我記得，曾經

多次與她和家人一起包餃子，還記得她經常在廚房做菜，燒大鍋紅燒肉，地板都黏乎乎的。大女兒德蘭1978年來倫敦探親，結果與母親鬧得很不愉快。此後，我去北京拜訪過她。熊德蘭是大學老師，備受尊敬，為高級外交官員教授英語。她獨立自信，不隨波逐流，招待客人時，一反熱情好客的傳統理念，不去專門精心準備一大堆菜餚，而是仿效英國人燉菜的習慣，只燒一道菜。退休之後，她寫了很多膾炙人口的小說，其中有不少是自傳性內容，向中國讀者講述她在二戰時期撤離倫敦、與汽車司機一家人生活的經歷。他弟弟德輓為人低調，但魅力十足，我們在北京見過好多次。我記得他告訴我，說自己在文革時儘可能躲避參與，每次聽到通知開批鬥大會，便往家中的衣櫃裏躲起來。

熊式一的子女個個出類拔萃，他們大都有家小，對外開放之後，好多孩子都先後出國留學，去倫敦看望蔡岱梅和德達，或者去華盛頓首府看望德蕙。熊式一和蔡岱梅夫婦倆的小女兒德蕙出生於英國，在英國接受教育，後來移居美國。父母之間的關係日漸緊張疏遠，她幫著斡旋，並且將分散各地的家庭成員維繫在一起，她還將大量的家庭資料、書信文稿保存了下來，正因為此，鄭達得以完成其先父的傳記寫作。德蕙始終盡力，支持幫助她的侄甥，他們現今不少在從事教育和翻譯工作，才華橫溢，延續了熊氏家族精通中西文化的優良傳統。

《熊式一：消失的「中國莎士比亞」》的章節標題，彰顯了熊式一的人生軌跡，從「天才演員」和「百老匯的明星」到最後「落葉飄零」。一方面，這是關於一個才情橫溢的文人和「中國莎士比亞」的故事，另一方面，這也是一段家庭破碎分離的悲情舊事。熊式一家年長的三個孩子在中國生活，1980年代終於有機會先後去英國探望母親了，但後者卻從來沒能重返故土；與此同時，熊式一如「落葉飄零」，在香港和美國之間徘徊，偶爾去台灣和中國作短期逗留。他享受過輝煌榮耀，也遭遇過災禍厄運，鄭達對這個日漸式微的人物所作的描

述精彩連貫。熊式一四處遊蕩，家人又分散居住在世界各地，所幸的是，熊氏家人完好地保存了大量的信件和文稿，包括回憶文字，鄭達因此能查閱參考，受益匪淺。

熊式一的生命歷程，象徵性地代表演變中的中國，反映了傳統與現代之間的矛盾，以及中國政治散民的悲情遭遇；同時突顯教育的重要性，並展現了1930年代中國在倫敦和紐約戲劇舞台上風靡一時的盛況。就此而言，熊式一是不容忽視的人物；正因如此，鄭達撰寫的這部傳記也不容忽視，它將熊式一的傳奇人生載入了史冊，世代相傳。

鄭達 譯

註 釋

- 1 譯註：界限街是香港九龍半島一條東西向的街道，根據1860年《北京條約》，清朝政府將九龍半島南部的一部分割讓給英國而劃分的分界線（boundary line），後來發展成為今日的界限街（Boundary Street）。